

新出两种《开宝藏》残卷考述

孙长青◎

内容提要:曾有多篇文章对《开宝藏》遗存本的情况,进行过相应的讨论。本文从经卷形态与内容上,对已见《开宝藏》存卷进行了较全面的介绍。对《开宝藏》本《中论》卷第二的流转情况进行梳理的同时,亦从法国国家图书馆藏《阿难七梦经》的发现,明确了敦煌地区曾存有一套《开宝藏》的事实。

关键字:开宝藏 《中论》 《阿难七梦经》

作者简介:孙长青,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开宝藏》的情况概述

开宝四年(971)宋太祖敕命高品张从信至益州(今成都)雕造大藏经印版,中国首部官方刻板大藏经由此诞生。这部藏经刊刻于开宝年间,因此多被称为《开宝藏》,又因刊刻工作由政府主导也就被称为“敕版大藏经”。也有学者因其在蜀地刊刻,故称为“蜀版藏经”,《开宝藏》的经版雕完后曾移送北宋都城汴梁的太平兴国寺与显圣寺,并不断的进行过增补,所以独称其为“蜀版”值得商榷。《开宝藏》每部经,首版二十二行,每行十四字,首行刻经名、卷次、千字文帙号,第二行用略小字刻译者。从第二版起,正文部分每版二十三行,每行十四字,版首以小字刻经题卷次,版号,千字文帙号,卷末多有雕造年月及印经题记。该藏经以蜀地一部《开元释教录》入藏录为底本的写本藏经为依据进行雕刻,由于当时各地藏经虽多以《开元释教录》入藏录为依据,但相互偶有歧异。现《开宝藏》全藏无存,故它当时所依据底本的详情不清。大抵约四百八十帙,千字文号由“天”至“英”字,收入经典五千余卷,计有十三万版片。此为《开宝藏》的初雕版。

《开宝藏》初雕的经版,在太平兴国八年(983)运至东京太平兴国寺。太平兴国寺内设译经院,负责对本国僧侣自行带回、外国君民进献、禁中所藏、民间赎买、以及朝廷组织僧侣到西行求取的外文佛教典籍进行翻译。译经院将新译典籍进呈皇帝,经批准后入藏流通。太平兴国八年,宋太宗下令将译经院改为传法院,另在太平兴国寺内成立印经院。印经院负责对新译经典进行流通,传法院统筹译经与流通的工作。至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大藏经版移送到显圣寺的圣寿禅院前,《开宝藏》的新经翻译与印刷工作均在太平兴国寺内完成。

作为第一部刻板大藏经,《开宝藏》很快就传到周边各国,《开宝藏》成为北宋与周边各政权进行文化交流的一种有效工具。《开宝藏》被北宋颁赐给日本、朝鲜、越南、女真、西夏、龟兹、沙州等地。有的地区甚至不止一次,向北宋请赐藏经,可见《开宝藏》得到周边国家的重视。

《开宝藏》被远赐外邦的同时,在国内也被各大寺院请印,从此不难想象出此部大藏在当时流传之盛。可惜的是在靖康二年(1127),《开宝藏》的经版在宋金战事中遗失。这副经版只存在了一百五十多年。千百年后的今天,人们无缘再窥此藏全貌。哪怕是《开宝藏》的残卷也是世间罕见,目前已知《开宝藏》印本不过十几卷。

对现存《开宝藏》经卷情况,多有文章进行介绍。由于经卷是陆续被发现,导致各文在介绍时出现卷数缺少,也存在数据错误等情况,因而有必要对《开宝藏》存卷的情况进行重新梳理。

1.《大般若经》卷第二百六,“秋”字号,现藏山西省博物院,存第10—25版共16版,第10版仅存17行。存开宝五年所刻雕经题记,元符三年(1100)鉴峦的请印戳记。1965年由山西省陵川县的段振华捐赠。

2.《大般若经》卷第五百八十一,“李”字号,现藏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存第7—24版共18版,第7版仅存12行。存开宝五年所刻雕经题记,无印刷年代。1959年在山西省孝义县兴福寺被发现。

3.《大宝集经》卷第一百一十一,“文”字号,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存第8—33版共26版,第8版仅存11行。刊经题记已经残缺。卷尾的背面有五行装藏记。2007年国图由私人收藏者手中购得。

4.《大方等大集经》卷第四十三,“有”字号,现藏上海图书馆,29版全存。无雕造年代,存印工“李庆印”墨记,有大观二年(1108)年鉴峦的请印戳记。原为叶恭绰藏品。

5.《妙法莲华经》卷第七,未刻千字文号,现藏高平市博物馆,存第20—29版共10版,第20版仅存7行。存开宝四年所刻雕经题记,印工“周安印”墨记,熙宁四年赐经版于显圣寺交由演梵大师慧敏等管勾戳记,大观二年鉴峦的请印戳记。1985年由高平县城南河西镇焦玉书上交至县博物馆。

6.《佛说阿惟越致遮经》,“草”字号,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存35版,其中第1版仅存2行,第3版仅存1—5行(第5行存3个残字)与11—23行(第11行存3个残字)。存开宝六年所刻雕经题记,有印工“陆永”墨记,熙宁四年赐经版于显圣寺交由演梵大师慧敏等管勾戳记,大观二年鉴峦的请印戳记。原藏于山西省太原崇善寺。

7.《大云经请雨品第六十四》,“大”字号,现藏高平市博物馆,存第5—31版共27版。李富华先生提到此卷第4版曾留有10行^①,可惜现在无法见到。存开宝六年所刻雕经题记及印工“随菩”墨记,无印刷年代。1985年由高平县城南河西镇焦玉书上交至县博物馆。

8.《杂阿含经》与《圣法印经》缀卷,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包含五个文献。前三纸为《杂阿含经》卷第三十,千字文号为“盛”,第一纸4行对应原版得首4行,第二纸23行对应原经第6版,第三纸15行对应原经第7版4—18行。第四至六纸为《杂阿含经》卷第四十,千字文号为“川”。第四纸10行,对应原经第1版第6—15行。第五纸与第六纸共16行,对应原经第3版第15—23行与第四版第1—7行。第七纸10行,对应《杂阿含经》卷第三十五,第1版13—22行,千字文号应为“川”。第八纸13行,对应《杂阿含经》卷第四十四,第7版第3—15行,千字文号应为“流”。第九第十纸对应《佛说圣法印经》卷尾经文18行,同时存元康四年(294)译经记四行,开宝七年所刻雕经题记及“入内内侍省内侍黄门勾当印经院 刘惟德”刊记。

9.《杂阿含经》缀卷,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此卷包含四个文献,第一纸22行,对应为《杂阿含经》卷第三十九首版,“川”字号。第二纸23行,对应《杂阿含经》卷第三十第8版,“盛”字号。第三纸13行,对应《杂阿含经》卷第二十一,第2版第1—13行。第四纸18行,对应《杂阿含经》卷第四十四,第5版第4—21行。第五纸13行,对应《杂阿含经》卷第四十四,第4版第3—15行。未刻雕经题记,加盖了印工墨记等信息。

10.《佛本行集经》卷第十九,“令”字号,现藏日本京都南禅寺,22版首尾全。存开宝七年所刻雕经题记,有印工“孙清”墨记,熙宁四年赐经版于显圣寺,交由赐号智悟大师的怀瑾管勾的戳记,无刷印年代。

^① 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70页。

11.《十诵律》卷第四十六，“存”字号，现藏日本书道博物馆，46版全。存开宝七年所刻雕经题记，印工“陆永”墨记，大观二年鉴峦的请印戳记。中村不折在1923年带回日本。

12.《御制秘藏诠》卷第十三，未刻千字文号，现藏美国哈佛大学。存图画4版，文字14版，共18版。图画无版号，文字对应原版的第2至15版。未刻雕经年代，存印工“邵明印”墨记，大观二年鉴峦的请印戳记。

以上内容，主要参考《开宝遗珍》^①拟定经名及顺序介绍。从物理形态上来讲以上共十二卷，从经文内容上来看主要涉及到十七卷经的内容。

此外，薛荣哲在介绍青莲寺保留的藏经时曾指出“本世纪三十年代，这批藏经中的三十八卷北宋《开宝藏》曾赴京展览，其后丢失两卷，剩三十六卷被卫立煌借去，下落不明。”^②此外王丁从西域地区出土的刻本佛经残片中，推断其中存有《开宝藏》的经卷^③，此中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确认。李富华根据日僧鹤饲彻定的《古经题跋》与西村兼文的《古经跋语》中，分别提到过《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一与《龙树菩萨劝诫王颂》的刊记，从而把两部经计入到《开宝藏》遗存中^④。因未见原实物及照片，故本文未将二经纳入到统计中。

二、新出《中论》考述

《开宝藏》本《中论》卷第二的存在，早被世人所知。2018年7月西泠印社春季拍卖会上，此残卷的出现，再次引起社会的关注。该残卷现存卷末两纸，第一纸长20.3厘米，高32.5厘米。存经文五行，尾题“中论卷第二”，刊经题记分作两行“大宋开宝七年甲戌岁奉 / 敕雕造”及印工墨记“陈宣印”。

第二纸长14.3厘米，高32.5厘米。存四行印经戳记：

“盖闻施经妙善，获三乘之惠因；赞诵真诠，超五趣之业果。然愿普穷法界，广 / 及无边；水陆群生，同登觉岸。时皇宋大观二年岁次戊子十月 日毕。

庄主僧 福滋 管居养院僧 福海 库头僧 福深。

供养主僧 福住 都化缘报愿住持沙门 鉴峦。”

与鉴峦法师相关的请经戳记，同样存在从上文介绍过的《大方等大集经》卷第四十三、《妙法莲华经》卷第七、《十诵律》卷第四十六、《御制秘藏诠》卷第十三、《大般若经》卷第二百六、《佛说阿惟越致遮经》中。以上各经除般若经为元符三年印造，其余各卷均为大观二年印。可以说，现已知《开宝藏》的存本中，多数为鉴峦法师请印。

对鉴峦法师及所主持的青莲寺，有学者进行过一定的考证^⑤，此处不再赘述。根据相关结论可知，现存元符三年与大观二年的《开宝藏》存本，均为鉴峦法师主持晋城青莲寺时，到开封显圣寺的印经院所印藏经的遗存。此《中论》卷第二，亦属青莲寺旧藏本。

在《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文集》，曾收叶恭绰所撰《历代藏经考略》一文。文中叶恭绰自称藏有《开宝藏》本《大方等大集经》卷第四十三及《中论》卷第二经卷^⑥，文末附上《中论》卷第二图版。此文系较早提出，此经卷存在及附图的文章。

① 方广锜、李际宁主编：《开宝遗珍》，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15—33页。

② 薛荣哲主编：《泽州古代文化荟萃》，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15页。

③ 王丁：《初論〈開寶藏〉向西域的流傳》，佛教文獻と文學，日臺共同ワークショップの記録，2008，67—96。

④ 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71页。

⑤ 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73页。

⑥ 叶恭绰：《历代藏经考略》，文见张曼涛编：《大藏经研究汇编上》，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年，第55页。

目前关于叶恭绰收藏《开宝藏》本《中论》一事，网上存在几种说法。一种说法是1938年叶恭绰在敦煌考察时，在公厕内从工人索要的手纸中，有此《中论》卷第二。叶恭绰在《历代藏经考略》的撰文中，提到自己已藏有《中论》残。此文末所记时间为“中国民国二十五年九月十日”，其时当为1936年故上述在1938年敦煌偶得一说与事实相悖。还有一种说法是在1927年7月，时任北京大学国学馆馆长的叶恭绰在敦煌考察。因身体原因，向身旁的民工要手纸，民工从沙土中捡了两张废纸给他。这其中一张就是《开宝藏》本的《中论》卷第二残卷。1927年4月叶恭绰参与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与瑞典斯文赫定远征队合作，考察团也确实曾去中国西北探险。考察团人员情况及考察经过，徐旭生有详细记录。1927年5月9日由徐旭生带团，从北京乘火车出发，10日到内蒙古包头。出发时随行中国团员八名^①，在7月12日计划增加中国学生两人^②。出发及增加团员名单中，并无叶恭绰其名。另据此书附录“中国学术团体与斯文赫定博士所定合作办法原文”，考察线路计划“由北京经包头，索果诺尔（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哈密，迪化（今乌鲁木齐），罗布诺尔（今罗布泊）至车尔成（今新疆且末县）。”^③《西游日记》分为“自北平至额济纳河”“由额济纳河至哈密”“由哈密至回北平”三卷^④。可知从线路规划到实际考察此团均未经过敦煌。此外日记所附合作办法中，明确规定“不得以私人名义购买古物等”对“收购或采掘之物处理方法”也有明确的条文规定。如叶恭绰随团得到《开宝藏》本《中论》卷第二，亦应上交，而不会归个人所有。因此1927年叶恭绰在年敦煌考察时，得到《中论》卷第二，此说也不足信。还有一说是，1927年叶老在古玩集市上买水果，卖水果的老人随手撕下两张纸包水果，其中一纸为此《中论》卷第二。目前就叶恭绰如何得到《中论》卷第二之事，还待其他资料来考证。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开宝藏》本《中论》卷第二残卷在叶恭绰手中是如何流转到私人卖家手中。据《叶遐庵先生年谱》“(1937年)三月，建立上海法宝馆……专储佛教文物，并以家藏之物捐存馆中^⑤”。在《上海近代佛教史》中也有法宝馆的介绍“法宝馆为佛教图书文物馆，1937年2月由叶恭绰（誉虎）捐资在上海觉园内建成……馆内二楼至三楼，分设法物部、图书部，收藏古代法器、法物及宋、元名画、佛像和明南北二藏与各种版本的佛经。还有邳县羊山端山寺所藏明代正统年间印的《大藏经》一部，亦藏于该馆。”^⑥从游有维的介绍可知，法宝馆所藏佛教文物实属不少。以上两文关于法宝馆成立时间略有相差，同时均提到叶恭绰向法宝馆捐赠与捐资之事，似法宝馆不在叶恭绰名下。法宝馆归属的问题，可以从叶恭绰与张寿镛和吕碧城二人的两封的书信中找到答案。在与二人信中叶恭绰曾明确表示此馆是自己出资“独立从事”及实际负责人系自身^⑦。亦就是说，法宝馆为叶恭绰独资成立，属于私人收藏机构。此时《开宝藏》本《大方等大集经》卷第四十三与《中论》卷第二，仍为叶恭绰所有，也极有可能藏于法宝馆内。1958年，顾延龙在回复叶恭绰的信件中也谈及法宝馆之事^⑧，从信中可以看到叶恭绰有意将法宝馆捐给渊源颇深的合众图书馆使用。但此时私立的合众图

① 徐旭生：《徐旭生西游日记》，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页。

② 徐旭生：《徐旭生西游日记》，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2页。

③ 徐旭生：《徐旭生西游日记》，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66—269页。

④ 徐旭生：《徐旭生西游日记》，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年，目录页。

⑤ 遐庵年谱汇稿编印会：《叶遐庵先生年谱》，遐庵年谱汇稿编印会1945年，第353页。

⑥ 游有维：《上海近代佛教简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10页。

⑦ 柳向春：《叶恭绰所建法宝馆出借与捐献事钩沉》，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4151081。（阅读时间：2019年8月14日。）

⑧ 同上。

书馆性质已经发生变化,1953年合众图书馆被捐给上海市政府,并改名为上海市合众图书馆。1955年上海市合众图书馆更名为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至1958年上海图书馆、上海市科学技术图书馆、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上海市报刊图书馆合并,成立了新的上海图书馆。亦即1958年,原私立的合众图书馆已经成为新的上海图书馆。捐献法宝馆一事,几经周折,至1960年经上海文化局将法宝馆清单以及捐赠奖函寄给叶恭绰,标志着法宝馆交由国家管理。捐赠的结束,意味着法宝馆藏之物,由私人所有转为公共财产。馆内所藏之物清单,目前还未被发现,但从原叶恭绰所藏《开宝藏》本《大方等大集经》卷第四十三,已被上海市图书馆收藏一事可推知,20世纪70年代后,上海市文化局曾将法宝馆中部分文物移交至上海图书馆。

关于《开宝藏》本《中论》卷第二,后期的流转,有被上海图书馆收藏一说。^①但不久李际宁也撰文表示不知去向。^②

三、新出《阿难七梦经》考述

2018年方广钊教授与定源法师等人至法国国家图书馆,调查整理法藏敦煌遗书。得见《开宝藏》本《阿难七梦经》一件。此卷残缺严重,仅存卷尾。正文隐约可见“得□…□后事”三字,经卷的尾题只保留“梦经”二字。现存早期刊经题记“开宝七年甲戌岁□/□…□造”,残存勾当内侍刊记“□…□省内侍黄门勾当印经院”。图中尾题下有伯希和编号“G181”。

此残卷的图版,台湾陈昱全在《北宋〈御制秘藏论〉版画研究》第268页附图,并表示引自Monique Cohen与Nathalie Monnet著《Impressions de Chine》一书中。^③至今大陆尚无人对此经进行讨论。

北宋惟白法师在崇宁年间曾阅读过《开宝藏》,并撰写了《大藏经纲目指要录》一书。惟白法师所著书中,《阿难七梦经》所在千字文号为“无”。与《赵城金藏》《高丽初雕藏》《高丽再雕藏》中,此经所在千字文号一致。法藏本与以上各藏中此经图版对比,可以看出:

1.《赵城金藏》本的尾题为“佛说阿难七梦经一卷”,《开宝藏》本现因残缺仅能看出“梦经”二字。高丽二藏经卷的尾题均是“阿难七梦经”。《赵城金藏》本与《开宝藏》本至少多出“一卷”二字。

2.尾题中,《赵城金藏》本作“经”,其他各藏包括开宝藏均作“經”。此为第二处不同。

此藏本为《开宝藏》与《赵城金藏》《高丽初雕藏》《高丽再雕藏》的比对,研究大藏经的相互影响提供了新的材料。

此外伯希和的编号,也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伯希和编号“G181”乃其对敦煌北区石窟的编号,此号对应敦煌文物研究所编号为第464窟。^④敦煌藏经洞在南区,故此经残片并非出自藏经洞。

关于敦煌地区向宋廷,请印佛经有如下几条信息可供参考:

1.至道元年(995)…五月,延禄遣使,来贡方物,乞赐生药、膳茶、供帐什物、弓箭、铙钹、佛经,及赐僧圆通紫衣,并从之。^⑤

① 宿白:《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7页。李际宁:《佛经版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6页。

② 李际宁:《近三十年新发现的佛教大藏经及其价值》,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论文集:第二届,第91页。

③ 陈昱全:《北宋〈御制秘藏论〉版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师范大学美术学系1998年,第247页。

④ 徐自强:《新订敦煌莫高窟诸家编号对照表》,《北京图书馆馆刊》,1996年第4期。

⑤ 郭声波点校:《宋会要辑稿 番夷道释》,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78页。

2. 至道元年…十月，延禄遣使上表，请以圣朝新译诸经，降赐本道，从之。^①

3. 景德四年（1007）…闰五月，沙洲僧正会请诣阙，以延禄表乞赐金字经一藏。诏益州写金银字经一藏赐之。^②

4. 大中祥符七年（1014）四月，……贤顺又表乞金字藏经泊茶药、金箔，诏赐之。^③

曹延禄与曹贤顺，曾先后领导过敦煌地区的归义军。以上前三条史料与曹延禄有关。至道元年曹延禄请宋廷将新译经赐给敦煌，宋廷同意了曹延禄的请求。此时宋廷赐予敦煌的新译经，版本理应为太平兴国八年后印经院所刻经典。但为何曹延禄只求新译经，而未请印整部《开宝藏》？应为最迟在至道元年，《开宝藏》本藏的前480帙已经传到了敦煌。^④此事当与上述至道元年五月的敦煌地区请赐佛经有关。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年十月，敦煌又向宋朝请印新译诸经。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开宝藏》本《阿难七梦经》，残存“□…□内省内侍黄门勾当印经院”勾当内侍刊记一条，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杂阿含经》与《圣法印经》缀卷”末的刊记“入内内侍省内侍黄门勾当印经院 刘惟德”内容极为接近。杜成辉据“入内内侍省黄门”改“入内内侍省内侍黄门”的时间，推断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杂阿含经》与《圣法印经》缀卷”为太平兴国寺时期印本，大概在大中祥符二年（1009）以后刊印。^⑤ 应注意的是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缀卷，为多部残卷拼接。每卷刊印时间不详，具体在何时何地缀接，亦没有相关资料。以拼卷中一条刊记记录，来确定缀卷在同一时间刊印，尚缺少相关的证据。同时在文中，杜成辉提出内侍省与入内内侍省是不同的机构，“勾当印经院”一职，由入内内侍省派人主管其事，但却未给出相关论据。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赵城金藏》复刻《开宝藏》本《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一中，复刻了《开宝藏》本刊经的题记“大宋咸平年奉敕雕”分作两行，同时复刻了“编录通慧大师赐紫沙门臣云胜教（校）勘”“内品监印经院臣陈景崇”“内侍殿头高品勾当印经院臣郑守钧”三条刊记。刊记中“勾当印经院”的郑守钧为内侍殿头高品，可见内侍省也同样参与了印经院的管理。杜文提出根据刊记中人员职务，推断经卷刊印时间的方法是可以借鉴的。其中具体情况，有待后续研究。

前文已经介绍，《阿难七梦经》在《开宝藏》中千字文号应为“无”，系开宝七年雕版。“无”在千字文顺序中为第303字，此经又存“勾当印经院”刊记。可以肯定这部经就非新译经，而应是雕于成都，印于太平兴国寺的印经院。敦煌在至道年间获赐宋廷新译经，《阿难七梦经》的出现，可以证明敦煌至少存在过一部完整的《开宝藏》。

结 语

《开宝藏》的出现标志着汉文大藏经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对其雕造、流通、影响等一系列问题，仍待人们继续挖掘。《开宝藏》本《中论》卷第二与法国国家图书馆藏《阿难七梦经》的发现，为《开宝藏》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责任编辑 周广荣）

① 郭声波点校：《宋会要辑稿 番夷道释》，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78页。

② 郭声波点校：《宋会要辑稿 番夷道释》，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80页。

③ 郭声波点校：《宋会要辑稿 番夷道释》，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80页。

④ 方广锡：《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01页。

⑤ 杜成辉：宋代印經院考 중국사학회 중국사연구, 97 권 117—138.